论郭小川五十年代的诗歌创作

洪子诚

如果粗略地加以划分的话，郭小川建国后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五十年代(1954—1959)，第二阶段是六十年代前期(1960—1965)，“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5)是第三阶段。在最后阶段，由于郭小川在政治上和创作上受到严酷的迫害和钳制，也由于他思想上受到的束缚，作品数量不很多，质量上也没有达到他原来已有的艺术水平。不过，《团泊洼的秋天》(1975)《秋歌》(1975)等，无论在揭示诗人的赤诚胸襟上，还是在抒写值得重视的生活哲理上，仍是值得肯定的佳作。至于前两个阶段，情况要稍微复杂些。一般来说，评论界一贯高度肯定以《甘蔗林—青纱帐》等为代表的六十年代的创作成就，认为这是诗人创作的成熟期，而对五十年代的创作，则往往重视不够，或者多有贬抑。下面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五十年代的1956至1959年，郭小川在生活中有过“误察”，创作上则有过“迷惘”，是他创作的“迷惘”期；因为他发表了《致大海》《望星空》这样的抒情诗，写了《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一个和八个》这样的叙事诗，它们在思想情调上有严重的缺陷和失误，表明在创作思想上出现方向性的“迷惘”。

目前，认识上述观点的偏颇似乎已不困难：近二三年来，报刊上重新评价上述诗作的文章屡见不鲜，有的同志也修改了关于“迷惘”期的说法。但是，为评价失当的某些作品作必要的辩正，还不能代替对郭小川在这个时期所进行的大胆的艺术探索的考察。从创作思想和艺术个性上对郭小川五十年代的创作做比较系统的分析，对准确地了解这位诗人的成就和局限，认识他在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是尚待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工作。

一

建国后，郭小川是从理论宣传转向诗歌创作的。他的第一批有影响的作品，是1955到1956年间用“楼梯体”写的《致青年公民》组诗。这个组诗共七首，其中包括当时在青年读者中产生过较大鼓动作用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和《向困难进军》。在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展开的历史时期，郭小川“情不自禁地以一个鼓动宣传员的姿态”(《月下集·权当序言》)，对青年人发出召唤，要他们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重重困难面前生长革命意志，勇敢地投入火热的斗争，把自己壮丽的青春与祖国，与社会主义事业联结在一起。强烈的时代感，从时代生活的广阔视野上选取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马雅可夫斯基式的豪迈壮阔的诗情和政论色彩，诗人与读者之间情感交流的抒情方式，是这些作品的主要特色。

然而，过了不久，郭小川就不满意他的这些作品。他说，对于评论界的《投入火热的斗争》等怎样受到读者欢迎的说法，他感谢，但“从来就抱有很大的怀疑”；“作为一个作者，私心却以为不然”。郭小川的这种不满，是严格的，却并非是造作的“自谦”。它既包括艺术质

量，也指的是思想深度。从艺术表现上说，郭小川不满意它们偏重于思想的陈述和鼓动，也不满意它们是"一行行政治性的句子"(以上引文均见《月下集·权当序言》)，缺乏在生活中捕捉、积累的生动活泼的形象和语言。在思想与形象、观念与诗情的结合上，存在不难觉察到的生硬的痕迹；拿别林斯基在诗歌创作上提出的思想消灭感情，感情消灭思想这种高度融合的要求来衡量，它们的不很和谐是明显的。它们虽然显示了郭小川"不断地思考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的创作立足点，但作家的艺术个性还不是很鲜明。除了艺术上的不足外，这些作品的思想也还不够深厚。按照诗人自己的说法是，这是些"浮光掠影"的东西；诗人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虽有超出同时代某些诗歌作者之处，却还不能说是深刻而新颖的。

在颇负盛誉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创作保持这样清醒而严格的态度，这是那些有高度艺术目标的作家才所能有的精神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郭小川对《致青年公民》的不满，不仅是针对自己的创作，而是还包含着对当时诗坛存在的带普遍性的问题的总结。

建国初年，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诗人在新的历史门槛上会师，开始了他们艺术生命的新时期；不久，新的生活土壤又培育了一批年青歌者。在五十年代的前五六年里，诗歌创作在题材、主题的开拓上，在诗歌形象的发展上，诗与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上，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由于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由于革命战争的胜利在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面前展现了美丽的前景，也由于那一段时间社会生活呈现的稳定发展状态，诗歌创作出现了颂歌兴起的时代。以充满自豪感的情绪，赞美获得新生的祖国，并歌颂创造新生活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建设者，是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内容。这个期间，诗人的构思方式和形象构思方式，或者是从历史的对比中揭示生活的巨变和新的生活的意义，或者是挖掘新生活，特别是劳动中的诗情和美感。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和劳动者，在新诗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美学价值。对自然的描绘，也已经不是作为苦难生活的背景(如三十年代前期臧克家、艾青的作品)，已经不是对脱离、逃避黑暗现实的脆弱心灵的抚慰(象戴望舒、何其芳的早期作品)，大自然本身的价值，在这个时期的新诗中，必须赋予新的时代的象征，也必须与建设者的宏伟劳动相联系，才能得到诗人的承认和证实。

应该说，诗歌侧重歌颂生活的变化，歌颂有生命力的新的因素，这是一个充满信心的时代的开端在诗歌创作上的必然反映；我们要充分肯定其成就和价值。但是，就在同时，诗歌创作也已存在着在当时还不为许多人所认识到的严重问题。诗歌在某一方面领域得到开拓，另一方面则被忽略。题材、主题和形象的这种"历史性"转移，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也逐渐暴露了它的局限。这表现在：对生活热情的描绘和赞颂中，乐观自信与简单天真常常结合在一起；诗人对生活中的矛盾、困难和复杂的一面，缺乏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在对生活现象作色彩斑烂的描述的同时，对人的感情、心灵的探索挖掘则普遍被忽视。"昨天的酸辛只是叫我们把今天的幸福抱得更紧"(何其芳《讨论宪法草案以后》)，而较少思考幸福的保持和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只觉得我们处处遇到的，是新的诗句，是美的传奇"(冯至《西安赠徐迟》)，而较少顾及除此之外的其它因素。诗人预言，"贫困和苦难将被遗忘，幸福的道路迎着祖国开放"(公刘《在这庄严的时刻》)，而几乎不曾想到历史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和曲折。诗歌的职能和表现手段，更多地被理解为是描绘和赞颂，而多少放弃了与深沉的感情相联系的对生活的思索和探求。在当时，不少诗人真诚地认为自己不必对现实矛盾，对社会发展作深入的思考，而认为这种思考已经规定在现成的概念和文件中；诗人的责任，只是用具体的生活情景去印

证，去阐释。即使他们在生活实际中有独特深刻的发现，也往往要用现成的结论、概念加以清洗，改造成符合普遍要求的思想感情状态。

与上面的问题相联系的，是这个时期某些诗人的创作个性有渐渐模糊起来的趋势。诗人既然缺乏独立地观察和思考生活的自觉性，就会一定程度地把不可替代的"我"消失在所谓时代的、社会的"大我"之中的这种情况。在诗歌创作和评论上，人们往往并不是首先重视诗人各别的具体性、特殊性和感觉、认识生活的独特性，相反，提倡、鼓励的是忽视抹煞这种特殊性的从所谓群众的集体感受和认识出发的一般性和普遍性。有些过去已经形成鲜明的艺术风格的诗人，这个期间他们作品的基调随着生活的变化而明朗，但艺术个性却不是更浓烈。郭沫若的火山爆发式的抒情更多地让位给对中心工作和政治任务的阐释；冯至二十年代的浓郁真挚和四十年代的凝注沉思变得有些平淡；臧克家谨严结实的风格有了削弱；我们也很少再听到何其芳那柔和、略带忧郁的歌声；……在众多的朝气蓬勃的年青歌者中，也有某些人除了题材选取范围和色调浓淡略有差异外，有时也较难把他们区别开来。

郭小川是在对当时诗歌创作现状的深入考察基础上，来检查自己的劳动成果，并确定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他认识到自己以及当时诗坛普遍存在的上述缺陷。他对自己的《致青年公民》等作了不无过份的否定(说它们是"淡而无味的东西"、"粗制滥造的产品")。在1956年初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组的座谈会上，他尖锐地指出，目前诗歌创作落后于时代，落后于现实，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避开了或无视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他认为，"只一味叫喊伟大，伟大，也只能是表面的轻浮的颂歌"(《沸腾的生活和诗》，《文艺报》1956年第三期)。对诗歌创作现状的这种先觉式的清醒认识，使他苦恼，以至"有时真想放弃这个工作"，但也使他有可能做出"非得探寻新的出路不可"的抉择。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小川在五十年代中期，逐渐形成他明确的创作追求。他提出了诗，应该是"新颖而独特"的主张。在艺术上，郭小川认为，诗的源泉虽然是人民群众的生活海洋，但它不应该是对人民生活和情绪的粗糙的反映和简单的摹写，它是从这生活海洋中提炼出来的"不同凡响的、光灿灿的晶体"(《月下集·权当序言》，本段下同)。在思想上，他指出，诗的新颖和独特，就是要触动读者的"深心"，使他们"不止发生暂时的激动，而且引起长久的深思"；在这里，关键问题是作为诗的核心的思想，应当是作者的创见，而不是现成的流行的政治语言的翻版。诗人的这种思想创见，反映了他对现实生活矛盾的深刻理解；它的获得，以诗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去独立地观察、感受、认识生活为主要条件。

郭小川从创作实践上去实现他的艺术主张，是从1956年夏天开始的。在探寻新的出路，创作新颖而独特的诗上，他很快做出了成绩，显示了他巨大的创造才能。

二

从1956年夏开始到1959年，郭小川的诗歌创作主要有下列几个部分：剖析诗人生活志向、人生哲学的抒情诗《山中》(1956)、《致大海》(1956)；表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革命部队生活的长篇叙事诗《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这两首诗曾以《雪与山谷》的书名出版)《一个和八个》(均写于1957年)和《将军三部曲》(1959)；抒写诗人在反右斗争中的思想感情的《星期天纪事》《射出我的第一枪》《发言集》；1958年访问苏联的作品，如《十月的歌》《鹏程万里》；歌颂"大跃进"的形势，表现诗人对生活乐观展望的《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捷音破晓》

《朗诵会上的一段奇遇》；以及在建国十周年前后对共和国行程进行回顾思考的抒情诗《十年的歌》《望星空》《天安门广场》等。

这是颇为丰硕的成果。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它们的水平是不一致的。有的思想比较浮泛，是较为平庸的作品。有的作品对生活的理解，带着时代的明显的局限。真正显示诗人的创新意图，代表郭小川这一时期创作水准的，却是那些一再受到非难、引起争论的作品，即几部长篇叙事诗和《致大海》《望星空》等抒情诗。这里，我们不打算对这些有异彩的诗作做全面评价，而只打算了解它们的出现，在郭小川的创作道路和当代诗歌发展史上，输进了什么新的因素，提出什么主要问题，提供了什么经验。

首先，这些作品在题材上的突破是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叙事诗。当然，如果从表现民主革命时期的斗争生活这一点说，它们并没有太多特殊之处。建国初期到六十年代，把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和人民军队的英雄事迹写进文学作品，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潮流。郭小川的独特之处，是把战斗场面和斗争生活的英雄行为从"前景"的位置上移开，而着力表现在斗争尖锐激烈的年代革命者的爱情生活（《雪与山谷》），接触到革命队伍内部某些特殊的事件与缺陷（如《一个和八个》中因各种复杂原因产生的冤狱）。对于《一个和八个》，郭小川在"要敢于写别人不敢写的题材"上，有明确的考虑；而事实上，这确实显示了他那种大胆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气和识见。

在创作题材的选取上，作家接触到别人未曾涉猎的重要生活内容，有意识地冲破某一成文或不成文的"禁区"，这有助于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现实，有助于深刻揭示现实的真实状况。从这点上说，郭小川的努力是值得重视的。然而，题材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诗人达到的成就，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他通过艺术概括提出什么样的关于现实的"概念"——他凭借艺术手段表现出来的对现实生活认识、理解所达到的深广程度。可以说，郭小川上述作品的最主要成就，是他摒弃了平庸地、"浮光掠影"地解释、表现生活概念的弊病，而从光灿灿的诗的结晶体中，表现了诗人对社会生活矛盾的深刻的体验。

这里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郭小川的这些叙事诗，描述的是已经属于"历史"的生活图景和事件，社会主义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社会思潮的主流或潜流，诗人并没有直接触及，直接表达他的见解。相反，《致青年公民》等，即使比较浮泛、粗糙，上述内容都多少有所揭示。那么，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说郭小川的这些作品，在对现实矛盾揭示的深刻程度上，在不是回避，而是正视生活的复杂性上，是《致青年公民》等所难以企及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郭小川创作的艺术个性，了解他在观察、思考、表现生活上的独特角度和方式。郭小川是个关注时代风云，对社会脉搏感应敏锐的作家。但他不是从一般的角度上去反映这些问题，不是追求对有时代特征的生活事件的正面摹写：对生活过程描述的生动精微，不是他的所长。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提出、回答一个革命的生活道路、生活哲学和精神境界这一问题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环境和考验，革命者对待生活提出的任务所应坚持的生活准则和道德操守。《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等，回答的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规模展开时年青人的生活道路问题。诗人要他们不做旁观者，不做"自私自利的庸人"，而要做沸腾的铁水，"每一滴都发出高热"，做一个在"外表和心灵"上都"纯洁又朴质"的战士，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向困难进军。六十年代，郭小川那些脍炙人口的抒情

诗，如《林区三唱》《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乡村大道》等，也无不涉及相似的主题。在这些情思豪壮而藻饰繁丽的诗行里，无论是写内蒙钢铁厂、东北煤都抚顺，还是写北大荒风雪、大兴安岭青松；无论是歌颂南方甜美甘蔗林、厦门如鼓涛声，还是赞美乡村质朴大道、昆仑山壮丽风光，寄托的都是诗人对于革命人生道路的思索。对这个主题的开拓，一直继续到1975年，《团泊洼的秋天》等，回响的仍是这一连贯的旋律。

五十年代郭小川的《致大海》《雪与山谷》《一个和八个》等作品的取材角度和阐发的主题也不例外，他正是从革命战士的生活道路和人生哲学这一侧面来把握和思考他所生活的时代的。与《致青年公民》等不同的是，在这些作品中，郭小川强调了人生道路的复杂，强调高贵品质、优美情操、丰富纯洁感情的获得和发展，要经历磨难和考验，是生活冲突锤击锻打的结果。《深深的山谷》里，女主人公大刘回忆的，是她在抗日战争严峻岁月里的一段爱情经历。她接受了与她同车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青年男子的爱情呼唤，但是，他们在革命信念、人生观上的严重分歧，使一度热烈的爱情出现了难以弥合的裂痕。最后，自觉到与新的时代无法协调，而又不愿回到黑暗现实中去的男青年走上了自我毁灭之路，而大刘这个革命战士的有些稚弱的心，也在感情痛苦的打击下逐渐坚强起来。作品表明，在这个战士的“生活的长长的河流里”，既有战斗，有光荣，也有过“沉迷”甚至“耻辱”；但她经历了这种波折而使生命达到新的高度。

比起《深深的山谷》来，《白雪的赞歌》要写得更完整，人物的感情、心灵的波纹也揭示得细致清晰得多。它与前者表现爱情因失去生活信仰的一致性的基础而酿成悲剧相反，歌颂的是与革命信念不可分割的革命者之间的感情联系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解放战争初期，“我”——长诗中的女主人公于植由于临产，离开她的丈夫——一个县委书记——从前方到了后方。不久，传来了丈夫在一次战斗中失踪、下落不明的消息。这给于植“沉重的打击”，“风暴般的痛苦攫住了”她的神志。在音讯杳然地等待着丈夫的两个年头中，她经历了感情上惊慌、恐惧的时刻，经历过信心“几乎在绝望的深渊中沉没”的“最危险的时刻”，也经历过与给她的儿子治病的医生之间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的动摇的时刻。然而，凭着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爱情的忠诚，她战胜了这种种考验，她的希望的花朵并没有衰败凋落。两年后，当她与英雄的丈夫团聚时，他们之间经历严峻试炼的感情，可以称得起是如白雪般的丰富、晶莹和纯洁。

在这几部长诗中，《一个和八个》为革命者的品质和信念提供的环境，可以说是最为严峻的。当然，由于情节比较复杂，诗人要用许多笔墨陈述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这对叙事诗来说是个沉重的负累），也由于诗人对这一生活事件的把握还不是那么透彻，因此，长诗对人物的刻划，对人物思想心理的描绘，都有某些粗疏之处。但是，事件本身的这种尖锐性，在人物关系中，在人物的思想感情过程中，还是得到相当程度的反映。长诗的情节是：八路军的营教导员王金，因为复杂的原因被部队当作叛徒，当作日本侵略者派来的奸细而被拘捕，投入随军临时监狱，与惯匪、逃兵、奸细等八名真正的杀人犯关在一起，并险些遭到被处决的境遇。这样的经历，使这个革命战士的思想性格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挤压”与考验：一方面是他所忠诚的革命集体由于误解对他的唾弃，一方面是同狱的真正罪犯挑衅性的凌辱。但是，王金在这种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比战场生死更为严峻的考验面前，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战斗姿态，考虑在这种特殊环境中对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并以他的人生观，以他思想品

格中蕴含的真理的力量，影响、改造这些罪犯，企望给这"黑暗的角落以亮光"。

从表面上看来，在这三首叙事诗中，《雪与山谷》二首是爱情题材。但是，诗人通过爱情生活所揭示的，却不限于爱情主题。这一点，当时的有的评论者就颇有见地地指出过："作者虽然写了爱情，他的主题却不在爱情，或者说，要比爱情更重要一些。作者写的是思想的主题，是政治节操……"（徐迟：《谈郭小川的几首诗》）可以说，《雪与山谷》与《一个和八个》的主题的某种一致性是明显的，那就是《白雪的赞歌》的结尾所点明的思想：

是的，你那忠贞的政治节操，
你那自我牺牲的不懈的辛劳，
更使我最确切地望见：
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攀登得多么高！……

对于革命者的生活道路和政治节操的表现，郭小川的这些作品突出了下面的两个因素：一是前面已经提及的考验的严峻性和道路的曲折复杂。诗人所歌颂的革命战士的政治节操和生活信念，都经受了来自生活不同方面的严重考验。在各种各样的"严峻的风险"面前，郭小川没有遮盖、隐蔽他的人物内心产生的风波，他们的思想感情的矛盾，和战胜这些风险在感情上的艰难历程。但是，郭小川更通过这一过程的真切刻划，表现接受党的伟大真理的战士没有屈服，"没有丧失革命意志"，"没有辜负作为战士的声誉"。另一个被强调的因素是，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取得，是革命者在斗争环境中不断克服、战胜脆弱、沉迷、摇摆的结果。特别是，对一个知识分子出身而投入革命队伍的战士来说，这种思想感情的成长更需要"艰难地走过长途"；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厉声逼问"："——你是战斗，还是逃跑？"（《致大海》）《深深的山谷》中，在一次激烈战斗之后，男主角在悬崖边上曾有过长达几十行的自白，雕刻了一个利已主义者的苍白而可鄙的心灵。他参加革命，是为了"向革命索取对于我的酬劳"；他也愿意去创造"英雄的业绩"，但必须"先给我的欲望以满足"；他不怀疑革命会取得胜利，却因这胜利"不属于我"而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时代的"行商和过客"。郭小川让他跳下深深的山谷，说明拒绝改造、转化自己极端利己主义性格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只能扮演悲剧的主角，也宣判这种人生观和生活道路的毁灭。这一宣判，当然也反映了生活的逻辑，更重要的是表明诗人在这一问题上严格、而且是严厉的态度。与"山谷"不同，抒情诗《致大海》却表现了这种自我改造、这种严酷的自我斗争的成功过程。包含更多诗人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思想性格内容的"我"，在西北高原的风暴中，在真理的光辉的照耀下，从让"小小的荣誉或羞辱"纠缠脑际、从"知识分子的可怜梦幻"中解脱出来，抛开为个人命运"取得些微的改善"而反抗、怨恨的生活目标，摒弃一个脆弱的生命所具有的"渺小的哀愁"和"稚气的欢笑"，而渐渐地与周围的世界趋于协调，开始了真正的灿烂的人生。

就这样，在《致青年公民》中开始揭示的革命者生活信念、人生哲学的主题，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取得了具有真切的生活实感的展示，并得到了思想上的深化。诗人从侧重于对某些生活观念的阐释和鼓吹的构思方式，前进到把复杂的生活矛盾、丰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内心世界作为自己探索开掘的对象。生活和人的心灵，在郭小川的这些作品中，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生活信念和政治节操的问题被放在复杂和丰富的生活之中来考察，它们不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不再是某种虽豪壮却含糊的幻影。诗人通过有血有肉的生活图景和感情状态的展示产生的力量，的确达到使读者"不止发生暂短的激动，而且引起长久的深思"的效果。

三

诗人应该是个思想家，这大概是郭小川所首先注重的。因此，他把思想创见，作为诗歌的核心问题提出。而这种思想，在诗人的心目中，指的主要是对我们生活的时代的认识和理解，以及他用崇高的思想进行观察、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的社会理想。郭小川对社会生活、对我们的时代的见解，既表现在《致青年公民》等诗中，同样，也反映在《致大海》《雪与山谷》等作品中。不同之点是，在《致青年公民》组诗中，思想是裸露的。并非没有生动的形象。“青春不只是秀美的发辫和花色的衣裙”，“青春的魅力应当叫枯枝长出鲜果，沙漠布满森林”（《闪耀吧，青春的火光》）；“你们心上的世界如蓝天那样明彻而单纯，就连梦都象百花盛开的旷野那般清新……”（《投入火热的斗争》）——在这里，比喻、形象是一件衣衫，是思想之树上的绿叶，给这些裸露的思索带来色彩，增加可感的具体性。在《致大海》《雪与山谷》中，也不乏思想观念的直接陈述，时有精辟的哲理性警句，但诗人的见解、理想，更主要是通过对特定题材的独特处理，通过具体感情的抒写、具体生活事件的刻划透露出来。郭小川在这里提炼的是诗的晶体。经过这些不规则的多面的晶体的折射而发出的光线，不是微弱、微弱得有些苍白，不是单调，单调得有些简陋。它们带着生活本身具有的多种色调，发出多彩而眩目的熠熠闪光。

厌弃“冷漠、寂静、安详”，追求着“繁杂的事务”、“作战般的工作”的“沸腾的生活”（《山中》），把斗争看作是生命，看作是“最富有的人生”（《投入火热的斗争》），这是贯串郭小川建国后全部诗作的主调。他的诗，塑造了这样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他永远不能忘记“曾经而且今天还是一个战士”，他鄙弃“可耻的倦怠”，“生活的琐屑与平庸”，不希罕漫长而乏味的一生，而响往人的“生命力比平常要千百万倍伟大”的“神奇的一刹那”。他喜爱的景色，是“蓝天碧海之间的日出”，“朝霞映照着的高山瀑布”，“象闪电把黑暗的夜空爆炸”的“一朵朵钢花”。比较起西湖、桂林、滇地这些公认的秀丽景致，他宁愿赞美象三门峡、与战斗的人生相连的雄浑的美：“不是滇池的水呀，不是滇池岸边的山，滇池的山水，哪有这儿土热、山新、水味甜”；“不是西湖的风呀，不是西湖上的云烟，西湖的风光，哪有这儿天高、云淡、景色新”。这个战士，他的心永远为“战斗和劳动的热忱所填满”，直到生命的最后，即使化成烟，也“火药味很浓很浓”……

这样的豪情和人生哲学，在五十年代中期郭小川的诗作中，同样占主要地位。但是，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中又流动着另一股新的思想感情的潮水，这就是对大地上欣欣向荣的和平生活的热爱，对深厚的爱心和同情心的赞美，对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关怀、理解的温暖和谐关系的响往，和对革命者健康正常的个人生活的肯定。并且，在这一时期诗作中，他还努力探求这两种倾向、两个不同侧面——严酷与温暖、革命事业与个人生活、高昂坚定的斗争精神与温厚柔美的仁爱之心——的结合和统一。在《雪与山谷》等作品中，郭小川既看到它们之间制约的不可分割的主要一面，也看到它们之间不能相互代替的相对独立的一面。郭小川一再表明，革命信念和生活方向对一个革命战士来说，是他的灵魂、生命的支柱。在生活道路背道而驰的情况下，人们的即使曾有很深联系的感情也会破裂，如《深深的山谷》所描写的那样。面当斗争目标和生活方向一致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怀、支持等宝贵的感情联系，便如一根纽带，把他们连结起来，使他们在逆境中勇敢地去生活，战胜物质和精神上的匮乏、

困难和危机，正如《白雪的赞歌》在细致的内心刻划中所表明的。

革命者的个人生活（包括感情生活），在建国前后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有时是被当作个人的无足轻重的琐事来表现的。在一些作品中，它们是政治关系的附属和陪衬，用来从一个侧面说明人物的阶级立场的性质。另外一些作品，则强调革命者为了革命利益，必须自觉地将这种关系和感情加以抑制和割弃——这种处理，在特定的条件下是正确的、必要的，但又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合乎情理的。郭小川在《白雪的赞歌》里，表现了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于植和她丈夫爱情的基础："英勇的战斗就是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表现他们之间的感情联系，也是鼓舞他们战胜困难、英勇生活战斗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对于于植说来，在解放战争初期的艰苦的年头，对于战争的胜利信心，对于革命工作的热忱，是与她对自己丈夫的坚定的等待不可分割的。这就象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曾经广为流传的抒情诗从另一角度所揭示的那样：在前线战斗的战士，呼唤在后方的妻子"等待着我吧"，即使是别的人都已等得疲倦，都已相信"我早已不在人间"时，仍要认真地等待；因为，"那些没有等待的人，他们不会了解在炮火之中，是你拿自己的等待，才救活了我的命……"（西蒙诺夫：《等待着我吧》）

看起来，这里表现的不过是一种带虚幻色彩的意识，况且，爱情也不是一种逢凶化吉、驱灾避邪的"护身符"。可是，实际上，郭小川在这里描述的是生活真理。对于革命战士来说，他所忠诚的信念，他所献身的事业，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概念或飘渺的信仰，而是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密切关联的。就在郭小川写《雪与山谷》之前不久，另一位著名诗人在他的诗中用哲理性的语言把这一关系作了明确的阐述："每个人不是孤单的一个体积，人人维系着自己身边的一群——自己认识的人，一同劳动的人，命运相同的人，甘苦与共的人，自己所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正因为如此，人会变得勇敢，不惜抛弃自己去保护别人……"（艾青：《大西洋》）

在《一个和八个》中，郭小川则集中地揭示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歌颂革命者用"真理的巨大力量"去改造世界的崇高理想。教导员王金被抛到"一篷行将沉没的船只"上来。但是，郭小川虽然触及到革命队伍的"冤狱"问题，却并不是想把注意力放在揭露这一"阴暗面"上。相反，对于这一事件产生的原因及部队对它的处理，他从多方面作了解释，说明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是很难避免的。如果说诗人对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缺点有所针砭的话，那指的也仅是我们对于同志间的信任理解的不谨慎而产生的不必要的破坏和损害。但这些都不是这部作品的焦点。诗人的力量，主要放在表现王金如何用他的眼睛的光辉去"温暖烧热"这些罪犯的心，如何用"生命的星火"去"打开此地的阴暗生活"上。王金克制着对这些"旧世界的渣滓"的憎恶，为了"崇高的目的"展开了一场灵魂上激烈的战争。他用自己的行动，用自己先进的人生观和生活信念，去震撼他们那"沉重的枯萎的心"，用共产党人关于生活的真理这把钥匙，"打开他们的心灵的门窗"。这种努力，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他们看到自己历史的"血污"和"阴暗"，他们的生活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境界：

一股生命的欢欣的小河，
在各自的梦里发出潺潺的响声，
仿佛有一只神秘的温柔的手
抚慰着他们那残破的心胸。

对美好的生活、活跃的大地的热爱，对生命、对亲人、同志的热爱，对革命事业、对爱

情的忠诚，用自己广阔的胸怀，自己生命的光辉去照耀、温暖、改造周围的世界，改造哪怕是阴暗的角落，这就是这个时期郭小川对一个革命者思想性格所突出的侧面。同不少诗人一样，他用大海的形象，来塑造这种战士的性格，寄托他的追求和理想。他写道：大海，它——

仿佛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
袒露着他的硕大无比的前胸，
让一切光波在这里聚会，
让一切声音在这里喧腾，
让一切寒冷者在这里得到温暖，
让一切因劳累而乏困的人
在这里进入幻丽和平安的梦境。

诗人表示，他要以这样的大海为榜样，象春雷向大海学会呼唤，去吓退大地上的寒冬；象大雨那样把大海吐出的热气变成水滴，“普降天下，使禾苗滋长……”（《致大海》）在这里，革命人道主义的思想和情怀，闪射出动人的光辉。

郭小川在这些作品中，通过对革命战士的广阔的心胸，大度和宽容，为了“一种神圣的爱”而生活战斗的歌颂，反映了他对理想的、合乎人性的社会关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种追求中，郭小川并没有抹煞革命与罪恶的界限，他也没有否定革命战争和暴力行动在摧毁不人道的剥削制度上的重要的作用，他承认而且甘愿为了理想境界的到达而牺牲个人个性发展的过程，以至于“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诗人通过这些动人的诗篇指出，革命和战争的目的不能在它的行动方式自身中寻找。正是为了“伟大的爱”我们才有英雄虎胆，才学会憎恨；为了“灿烂风光，和平田园”，我们才去拼性命（《将军三部曲》）。诗人希望，我们的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一切的寒冷者和困乏者都得到温暖和平安的环境，那时候，人们都会自觉地用“圣洁的水”去洗涤“残留着污迹的心灵”，人与人之间将建立起充满“爱、理解和友谊”，用关怀、信任、支持等感情纽带联结起来的社会关系。

郭小川的这种社会理想，产生在五十年代中期是毫不突兀的。当时，我国社会发展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建设一个崭新的社会的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对于这个合理的社会理想，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关注我们时代生活进程的人们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人们的精神生活、道德准则、感情状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调整、建设，是那些对时代感受敏锐迅速的作家所首先思考的问题，也必然要在他们的创作主张和文艺作品中直接间接地加以透露。这反映在艾青的某些诗作中，反映在王蒙对革命者单纯和谐、不容许旧社会灰尘的丝毫沾染的心灵的理想中，反映在刘宾雁对革命队伍内部平等的、进取的关系的追求中，也反映在江苏“探求者”关于文学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以及新的道德规范探求的“宣言”中……郭小川也正是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上，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思想性格出发，把他当时对社会生活理想的探求，借助历史的图景有力地表现出来。

四

然而，正象文学史上那些探寻新路的作家难以避免的状况那样，郭小川在当时也面临许多矛盾。一方面，他的艺术探索，必然要打破社会和诗歌创作的一些陈规，这便招致了非议

和责难。《雪与山谷》发表后，评论上有肯定，也有批评。肯定是很审慎的，有的同志还善意地劝告诗人多写《向困难进军》这样有强烈鼓动性的诗，而不要把自己宝贵的精力浪费在诸如爱情生活的题材上。批评则越来越严厉，以至到了六十年代初达到几乎全部否定的程度。《一个和八个》当时没有得到公开发表就受到批判，它和广大读者见面是二十二年以后（1979年香港《文汇报》和湖北《长江》文艺丛刊先后刊载）。1959年的《望星空》（并因而捎带着《致大海》）受到严重批评，已经为大家所熟知。在这个时期主要的作品中，《将军三部曲》是例外，它所得到的较高的赞扬直至现在是不变的。

郭小川遇到的矛盾，还来自他的自身，他的作品本身。由于受到舆论的约束和影响，也可能由于对他所反映的生活，他对这个时代的思考，还存在着某种缺陷，以及用诗的形式对这些复杂的生活和思想进行概括上，诗人未必有相应的充分的艺术准备，因而，他的作品本身，矛盾的状况也并不难发现。说郭小川的创作出现"迷惘"，从上述的角度进行理解也未尝不可以。

郭小川的叙事诗，与他同时代及稍后的当代诗人叙事诗相比，与其说他注重的是生活和人物性格的逻辑，不如说他更刻意追求感情表达上的逻辑。不过，在《雪与山谷》中，诗人牺牲情节安排上的匀称、忽略人物刻划上的立体感，是为了把他那细腻而丰富的内心激情抒写得完整充实。而对于《一个和八个》来说，情况就并不那么简单。在表现用真理的力量对这些恶行累累的罪犯的改造上，诗人有时是有巨大信心的，有时又流露出可以理解的困惑。对于这些残暴的惯匪、杀害我军哨兵的逃兵、投毒的奸细，诗人揭露他们对革命队伍的仇恨，他们在行军过程中故意捣乱的卑鄙，他们的恶习是顽强而又积久的根性；但他也揭示了他们有可能被震动、被感召的可能性。在《生与死》一章中，他们与王金辩论着、探究着生和死的价值，琢磨着王金关于什么是"真正的美好的人生"的说明，漆黑的心灵中闪出"在生活的真理面前，也未尝不可有一点愧悔"的亮光。郭小川从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性格的复杂性上进行解释："……我们也曾经见过这样的景象：阴郁的天空有时忽然透了亮，在一个很短很短的瞬间，一条干瘪的小河一下高涨，在那潮湿的霉烂的败草中，突地出现一支美丽的荧光"。在这里，这种变化被表现为似乎是一种偶然的突发的现象，对这种改造的可能性并未赋予更有说服力的生活发展上的和性格发展上的依据。诗人并未透彻认识罪恶和亮光如何可以、又以怎样的关系生存在这些人的心里，而只能做出"当罪恶的念头隐伏起来，他们的心就忽然变得平静和清洁"的显得简单化的结论。这种表现，对于诗的主题的指示，只能起到妨碍的作用。

与此相联系的是，郭小川对体现在王金身上的革命人道主义、对用真理开启人们心中门窗这种力量的认识，也处在热烈歌颂与缺乏自信的矛盾中。郭小川并不想为这些罪犯所应承担的责任和目前的处境辩护，不愿也无力改变在当时环境中人民给他们以必要惩处的命运。但是，表现真理所产生的巨大力量的愿望冲击着他，他更愿意看到这种亮光终于照进了这个黑暗的角落。于是，在写到王金（他是无辜的）和八名匪徒（他们是罪有应得的）被押赴刑场时，这种矛盾的感情状态就必然产生。这时，在对于旷野和村庄的景色描绘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想像中，潜藏着一种在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前夕，对大地上欢乐和哀愁的生活眷恋、惋惜之情。而当那些罪犯在王金的倡议下，临刑前喊起革命口号，以"感情上的真挚"为王金求情，并表现了"从容就义"的神态的时候，不仅是在场执刑的锄奸科长，而且包括诗人在内，都陷于惊骇、进退维谷的境地："锄奸科长简直感到喘不过气，夜空仿佛撒下了无限的压

力”……在难以处理的矛盾面前，象古今中外许多作品求救于超自然性力量和偶然事变那样，郭小川借助日军发动的突袭，改变了事件发展的原来方向，使故事发生了“新的波折”，遂有了一次考验王金及其它罪犯的激战，使诗人从困境之中解脱。

郭小川的这种困惑和矛盾，还不仅表现在某一具体的作品中，也表现在这一时期不同题材或不同阶段的创作倾向上。在写作这几首叙事诗的同时，郭小川又写了一组反右派斗争的诗。它们写得很艰苦，反映着诗人的苦思和感情上的挣扎；他责备自己过于善良，对“敌人”进攻过于迟钝。虽然它们阐发的思想与《雪与山谷》等不同，但却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而1958年创作的《捷音破晓》《雪兆丰年》《县委书记的浪漫主义》等，歌颂“大跃进”，热烈的激情并没有减弱。但是，它们显示了诗人对生活的观察、感受上的浮泛，思想感情缺乏坚实的力量，是他从加强诗歌反映生活深度的追求上的后退。离开了对生活矛盾的深刻体验，离开了独特的眼光，诗人就只能停留在一般的思想和情绪的铺陈渲染上——尽管这种铺陈和渲染，是郭小川在艺术形式上新的艰苦探求的开始。郭小川这种向生活的深度突进的减弱和动摇的趋势，也反映在比较成功的《将军三部曲》(1959)中。对于将军这一人物的广阔胸怀，他的刚强、豪迈与柔美、细致的气质统一的性格，写得生动突出。但是，这一人物的思想感情深度，也受到很大的限制：诗人在一些需要较深入开掘的生活矛盾面前，不是如《雪与山谷》《一个和八个》那样突进，而是退缩和回避。

1959年《望星空》受到批评，和郭小川为此而作的诚恳的检讨，宣告从1956年开始的这段艺术探索的中断。《望星空》从诗人的心灵历程的角度，带有回顾共和国历史的性质。其实，在此之前，郭小川同类题材的诗还有一些，如《天安门广场》《十年的歌》等。这些诗的思想和艺术，是他“大跃进”时期那些写得较浮浅的作品的继续；但《望星空》却以更加复杂的状态，表现了郭小川创作上的这种强烈的矛盾和“迷惘”。在实际上，郭小川对我们国家和社会在当时出现的严重问题、错误和缺憾已有觉察，在思想情绪上表现了忧郁和痛苦——这种情绪，反映到《望星空》中来。在灿烂无垠的星空面前，感到大地上的生活远不是那么辉煌：这本来并不是在写一种抽象的哲学思想，而是一种现实矛盾的反射。但是，诗人或者是自愿、或者是被迫地后退了，以至于丧失了对自己观察思考的自信。他怀疑自己，责备自己，把这种思绪的产生，解释为一种不健康情绪，一种个人主义的发作，一种虚无的人生观的泄露。于是，在长诗的第二部分，便举起诗的解剖刀来剖析自己“远不辉煌”的灵魂。——当然，就是这种解剖、自责，在当时也没有得到通过；人们批评他的批判是乏力的。但是，如果诗人在前一部分的显得忧郁的感情，对现实的缺陷、错误的不满的情绪是真实生活的反映，他又如何能用有力的语言和形象对前者加以否定呢？

从此，郭小川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的某些优点得到继续、发扬，他在某方面的创造性达到人们所说的相当成熟的高度，而他独立地观察思考生活的创作思想则受到很大的削弱。他的明显的成绩和人们还未充分认识的不足，在六十年代前期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但这又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值得仔细研究的课题，它毕竟不在本文既定目的的范围之内。

一九八一年二月改毕。